

希特勒的追隨者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煉着無限制的忠誠、「黨性」的品格，然而所有這些美德都不過充當了獨裁者的工具。所以，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類道義之上，建立在對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礎之上，都可能充當極權統治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基礎。

他是在追求世界統治權。……這是我建築的全部意義。……我的全部打算是針對這個偉人將統治整個地球。」他只管完美的「藝術實現」，而不在意這種藝術到底是為着甚麼，正如一個歌唱家只要唱出最美的聲音，卻不管在歌唱着甚麼，他只是要讓人感動，並視之為藝術的高峰。這樣的專業人才是獨裁者最有力的幫手，有的發明機器，有的唱着頌歌，有的築着靈寢，有的成為幕賓，各各以助紂為虐的方式實現「人生價值」。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希特勒的追隨者們喪失了善惡美醜的判斷，如

果那樣，他們就是一些有「特殊秉賦」的人，這樣的人固然可怕，但畢竟也是「不可多得」。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煉着以無限制的忠誠、「黨性」打頭的品格，在堅守勤奮、紀律、節儉、服從、愛國、熱愛自然等一般道德上無可挑剔。然而，他們信奉的最高準則卻並非人類的公義與良心，所有的其他美德都不過充當了獨裁者的工具。

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類道義之上，建立在對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礎之上，都可能充當極權統治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基礎。

## 失敗者之歌

### ● 靳樹鵬



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成功者未必偉大，失敗者未必貌小。

陳獨秀是政治上的失敗者，他領導的大革命失敗了，他曾任總書記的中國托派失敗了，終至寂寞而死，但是關於他的論著卻日漸增多。據筆者有限的聞見，近十多年來有關他的傳記和年譜就出版了十多部，其中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王觀泉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筆力不凡。

廣泛深入地搜集和挖掘史料，遵守史學規範，用事實說話，是王著陳傳的特色。陳獨秀曾被誣陷為日本侵略者的漢奸，這頂漢奸帽子是甚麼人甚麼時候戴在陳獨秀頭上的呢？研究者都認為是王明、康生給他扣上的，或說是1937年，或說是1938年。唯有王觀泉以確切的史料指出，最早誣陷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漢奸的是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國時報》第39期，在該期第一版發表了署名伍平的長篇報導〈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面目〉，同時在頭版頭條配發了社論〈甘作日寇奸細的托洛茨基派〉。《救國時報》的報導及社論起因何在？蓋在此前兩個多月，有以魯迅名義在《文學叢報》和《現實文學》上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略去了來信人署名，報導的作者伍平遂誤以為陳××即陳獨秀。《救國時報》是中共在海外的機關報，編輯部在莫斯科，由廖煥星、李立三、陳潭秋等先後任主編，印刷廠和發行部在巴黎，由吳玉章總負責。《救國時報》曾兩次刊登這篇並非魯迅作品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從此《救國時報》上出現的全國民眾一致聲討托陳派甘當日本漢奸的『消息報導』遍及全國各地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廣西直至延安抗日根據地。還把報導觸角伸向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美國、巴西

等地區和國家」，「通過O.V.筆寫借魯之名陷陳獨秀為漢奸，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王著陳傳最突出的地方是忠誠地描寫歷史，不作偏袒的研究，對歷來沿襲的說法絕不盲目隨聲附和，因此，王著有許多創見，能言人所未言。

對前期的陳獨秀，如清末、辛亥革命、五四時期、建黨時期，論者大都加以肯定；對後期的陳獨秀，即從大革命後期到他逝世，甚麼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漢奸、取消派、反對和攻擊紅軍等罪名就都壓在他頭上了。王著陳傳對這些都一一分析和評說。

中國的大革命是被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葬送的嗎？王著認為主要是被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右傾的中國政策葬送的。比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口號是馬林而不是陳獨秀提出來的，這源於馬林對國民黨性質的右傾估計。這也就是王著幾次提到的共產國際的國民黨情結，他們之所以有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完全是從蘇聯的內政外交出發的。「誰都沒有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的中國政策『右傾』」，並且「右傾加霸道」，而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它的指令。

陳獨秀是中國托派的領袖，後來他不參加中國托派的活動，仍然是精神領袖，托派在中國要怎麼臭有怎麼臭。那篇以魯迅名義發表卻並非魯迅作品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許多

陳獨秀曾被誣陷為日本侵略者的漢奸，研究者大多認為是王明、康生給他扣上這帽子的。唯有王觀泉以確切的史料指出，最早誣陷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漢奸的，是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國時報》第39期署名伍平的長篇報導。該報是中共在海外的機關報，由吳玉章總負責。

陳獨秀曾說：「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他的反思被當時的中共和托派斥為反動。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人們才能冷靜客觀認識其價值和深刻性。

人從青少年受教育時就朦朧知道托派可能是天底下最不乾淨的東西。中共領袖也認為陳獨秀走向托洛茨基就是走向反革命，王著卻認為這是陳獨秀「走上另一條革命之路」。歷史本是追求着自己的目標的人的活動，歷史的發展道路也並不是預先就規劃好了的，應有多種探索和實踐，不能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歷史敘事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無須做事後諸葛亮。

陳獨秀最被詬病的是他還寫了一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的長文。在王著陳傳以前，凡說到陳獨秀此文的論著，都是說陳獨秀反對和攻擊紅軍，都是斥責一通了事。王著則冷靜地分析了這篇文章。「陳獨秀沒有看到『土匪』在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等軍事將領的教育改造下已質化為紅軍，這是他的錯誤，但是在這篇既有調查研究又有理論的萬言文中對於農民武裝、農村蘇維埃運動和農民的革命投入等問題卻有正確的部分」。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的社會，只有兩個階級（有產與無產）的力量決定一切」，因此「我們的結論是：游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絕對不能做我們的衛軍與支柱；缺乏土地的貧農，在中外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幾重榨取壓迫之下，勢必起而鬥爭，我們當然應該和他們有很好的聯絡，並領導他們的鬥爭，但僅僅是這個還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緊城市工人的組織與鬥爭，必須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

的政治罷工），才能夠得到城市及農村蘇維埃及赤衛軍的組織，才有轉變現有的所謂『紅軍』的武裝為民眾之直接武裝勢力一部分之可能。」王著認為：「陳獨秀的這個結論，在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中，除了有點教條主義外，大致是正確的。」

陳獨秀的名字是同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連在一起的，他臨死之前還埋頭文字學著作，還在思索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雖九死其猶未悔」。但他生前身後的事實卻使王觀泉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慨：「陳獨秀則走出監獄即被套上漢奸帽子，被拋出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線之外，默默地死在周邊毫無社會生氣的石牆院冰冷的竹蓆板牀上，偷『天火』點燃革命火種的『人類哲學日曆上最高尚的聖者兼殉道者』（馬克思語），終於沒有走下高加索……」

筆者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也有與王著陳傳不同之處，比如該書說「陳獨秀是抱着托洛茨基主義撒手人間的」。我則認為，在中共領袖和理論家中，最早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的就是陳獨秀，這與他對斯大林不滿而反對斯大林並沒有必然的關係。誠如他自己所說：「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他的反思既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制度層面的，其尖銳潑辣只能被當時的中共和托派斥為反動。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人們才能冷靜客觀認識其價值和深刻性。